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



一、基督教东来

世界上有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它们的创立历史悠久。公元1世纪起先后传入我国，最早是佛教，其次是伊斯兰教，后来是基督教。其中，伊斯兰教成为回族、维吾尔族等我国少数民族兄弟的特有信仰。基督教最初是比较统一的宗教组织，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了分裂。欧洲西部仍称基督教，欧洲东部改称东方正统教（简称东正教）。这就是东欧及俄国十几个国家把东正教定为国教的来源。

从3世纪以来，基督教会日益为剥削阶级所控制。主教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经商盈利，放高利贷，侵吞教会公产等，基督教日益腐化。卜伽丘的《十日谈》就是揭露基督教徒腐化堕落的代表作。16世纪宗教改革后，基督教再一次分裂。德国、瑞士、英国等国家统称只信仰耶和华一神的基督新教（即耶稣教、更正教）。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仍坚持信仰原基督教的天主教义。从此，基督教中又分裂产生了基督新教。两次大分裂后，基督教一分为三：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东正教。

基督教的三大教派进入中国的时间不同。远在唐朝初年（635年），基督教的一支——聂斯脱里派由波斯进入中国。当时称为景教。到了唐武宗时，发布了灭佛诏谕，下令毁灭天下佛寺，由此波及到景教。至此，景教告一段落。元朝兴起，基督教又传入中国。元世祖对宗教比较宽大，基督教在中国再一次盛行。1293年，意大利传教士乔伐尼·蒙高味若来华传教，并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召见。1298年，他在大都（今北京）修建了中国第一座天主教堂，并广收信徒。到1328年，由他布道而信教者达3万人之多，连元世祖忽必烈的母亲都成了他的信徒。但是，随着元朝的覆没，传教士在中国惨淡经营的基督教，也再次销声匿迹，在中国居民中很少留下影响。

到了明朝时期，三大教派才相继传入中国。沙忽略是最早东来的天主教传教士。但他也仅仅是来到了中国广东沿海的一个小岛——上川。因为那时凡不得皇帝许可的人，一概不准入境。

在16世纪，一部分天主教徒受着文艺复兴的鼓动，随着商人的足迹和西欧殖民势力的扩张，图谋向东发展传教事业。当时，欧洲最强大的殖民国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1557年，葡萄牙人获得了在澳门建屋居住的权利，澳门也就成为传教士渗入中国的第一座桥头堡。到1563年，在澳门的葡萄牙传教士达900余人。这些人都希望到中国传教，但因无法进入内地，只好都在澳门等待机会。那时的澳门已经成为非正式的居留地。

到1581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澳门。1583年，利玛窦获许在广东肇庆创立第一个天主教传教住院。1601年初，利玛窦进京朝见明神宗皇帝。他死后，万历皇帝还以北京二里沟佛寺及房屋38间、地基20亩赐为利玛窦葬地（即今北京城外教士公葬处）。利玛窦使得基督教在中国得以很大发展。1650年中国天主教徒达到15万人。崇祯末年，天主教已遍布在中国各重要地域，宫廷信教者也很多。

清朝在顺治和康熙初期，也很宠信传教士。第一个出任钦天监监正的传教士汤若望，与顺治关系密切。顺治有时还到他的住处吃饭喝茶。顺治年间，天主教又获得很快发展。康熙时期是天主教在华传教的辉煌时代。康熙1675年曾御驾亲临，北京天主教堂，并以御笔为教堂题词“钦天”二字。后来，所有在华的耶稣堂在鸦片战争前，都以此文题匾。

然而，由于欧洲天主教各派的“礼仪之争”，致使中国教民产生仇教心理。同时，由于基督教义日益显现出对中华民族固有的思想基础的威胁和天朝的尊严受到西方教士的侮辱，康熙实行了禁教措施。这就使得未领有朝廷印票的传教士被驱逐出境。教堂、教产也被剥夺。一些传教士弃教从商，潜伏内地，而那些有印票的耶稣会士，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器重了。中国人也不敢像过去那样自由出入教堂了。传教士的传教事业受到阻挠。自此，中国禁教长达 100 多年之久。

雍正在位时，也严格地执行了康熙的禁教命令。雍正曾经对教士解释了他禁教的理由：“你们都愿意使中国人成为教徒，……但是，如果这样，我们将变成什么样的人了呢？我们不很快就变成了你们国王的臣仆了吗？你们所招收的中国基督徒，已经只承认你们的权威，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了；在事故发生的时候，他们将只听你们的话，不听任何别人的话了。我知道，在目前，我们是无须惧怕这些的；但是当未来年间，外国船只来航中国海岸者以千百计的时候，事情是可能会发生的。”

乾隆、嘉庆时期，也同样继续执行禁教政策，致使传教活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特别是乾隆帝即位后，更加严厉地执行禁教政策。他曾对教士、教民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大搜捕。除禁教外，清政府又于 1757 年实行了闭关政策。禁教令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但是，清政府在禁教时时紧时松，所以传教士的活动范围仍然很广。

二、殖民主义者的先锋、向导

基督教能够向世界各地传播，始终没有离开过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和当时政权的力量。

16 世纪时，欧洲进行了宗教改革。与此同时，西欧的殖民主义者也先后来到东方。西方新兴资产阶级把基督教作为他们的工具，海外传教事业日渐兴隆。葡萄牙人以欺骗的方式租借我澳门，以澳门为根据地，在中国沿海、内地通商传教并从事间谍活动。西班牙也曾在传教士的怂恿下企图派军队征服中国，只是因为力不从心而未能实现梦想。

18 世纪以后，西班牙和葡萄牙丧失了它们以前的海外霸权，法、英、美、德等国家相继成为基督教的“海外布道”的“护法”者，法国的某些传教士不顾中国禁教之令，深入中国内地。英、美也派出大批传教士留在澳门、马六甲、新加坡等地，为进入中国作准备。

沙皇彼得一世执政时期（1682—1725 年），极为重视利用东正教以配合向东方扩张，曾多次派遣“教士”参加俄国商队来华秘密活动。

在沙俄尚未正式派遣传教士团来华前，沙皇政府曾经一再利用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为其效劳。1675 年，俄使与在北京的传教士南怀仁联系，窃取了一张中国地图和有关清政府在黑龙江战区战略计划等机要情报。1688 年，俄便以同样手段，又获取了有关中国兵力和武器装备的情报。

1818 年 8 月，沙俄政府各布道团下达训令说：“今后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在 1823 年俄国外交副大臣给宗教事务和教育部的信中说：“布道团神职人员应当从事中国人的农村经济、他们的家庭生活、农业等的情报收集工作。”1854 年又重申“布道团的主要目的，在于

通过新派到北京去的布道团监护官搜集有关中国及其领土的可靠情报。”东正教布道团的所谓传教活动，就是披着宗教外衣，到处搜集情报，盗窃机密或以“中国通”的身分直接参与沙俄侵略中国的种种不光彩的活动。

东正教自从传入中国后，就在北京成立据点。但他们并不像别的教派那样积极地发展教徒。从 1715 年起到 1860 年，在北京的东正教徒，包括定居的一些俄籍人在内，仅约 200 人，另外，在北京郊外以及哈尔滨、张家口、天津和汉口等地，也有少量的东正教徒，加起来也才 300 余人。由此可见，传教士来中国并不在于传教，而在于搜集情报和研究汉学两项活动。

俄国在使用武力侵占我国黑龙江大片领土之后，立即推行“边区俄罗斯化”的殖民政策，除对反抗者进行军事镇压外，还派东正教传教士前往为其服务。

自从 1715 年沙俄第一届“北京传教士团”（又称“布道团”）进驻北京后，又先后派遣了十二届传教士团来到北京。他们的经费是俄国政府供给的，他们要接受俄国政府的指示。他们把刺探政府机密和搜集中国情报作为主要任务，尽心尽力地效忠沙皇。“北京传教士团”在中国起着俄国政府的官方代表的作用。沙俄正是利用东正教“打开中国之窗”的，而“北京传教士团”是沙俄枢密院与中国理藩院之间最早的官方联络站。1738 年，随沙俄“北京传教士团”来京的“学生”罗索兴，就在其任翻译的理藩院中盗窃了一份详细的中国全图，转呈给沙俄枢密院。其中还有一随团“学生”，在一年之内就向俄国天文台提供了长达 231 页的中国气象情报。

当清朝国势日趋衰微的时候，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却非常迅速。英国在 17 世纪中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18 世纪末叶又开始了产业革命，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19 世纪初，英国的工业得到了很大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的国家。马克思指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英国资产阶级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垂涎已久，早就处心积虑地要打开中国的大门。英国为了扩张其殖民势力，曾专门训练一批传教士派往外国，利用他们作为殖民工具。著名传教士马礼逊就曾供职于英国的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他在英国对华进行经济掠夺中起了积极作用。马礼逊是西方殖民国家基督教新教派来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

美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达到对外殖民扩张的目的，美国也积极地派传教士进入中国为其对华侵略政策服务。

由此可见，西方列强从一开始就把传教士作为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工具。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传教士来实现政治的、经济的目的，他们在近代各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血腥历史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英、美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于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前的 20 多年间，特别是在战争前的四、五年间，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活动：一是搜集情报，大肆鼓吹采取强硬的政策来叩开中国大门；二是在中国为开展传教作准备。这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在搜集情报方面，传教士郭士立是个很突出的人物。从 1831 年到 1838 年期间，他曾到中国沿海侦察至少 10 多次。第一次他乘坐一艘中国商船于 1831 年 6 月 3 日从暹（xi n）罗出发，沿途经过福建、浙江、山东、一直到达天津。一路上，他仔细地刺探了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于同年 12 月 13 日返回广东澳门。驻澳门的英殖民机构——澳门东印度公司的一些负责人在听取了郭士立第一次到沿海侦察的报告后，非常高兴。为了获得更加全

面、详细的情报，他们请郭士立和 1 名懂测量河道、海湾和绘制航海图的人员乘船秘密到中国沿海进行了 6 个多月的侦察活动。窃取了中国厦门、福州、台湾、宁波、上海和山东沿海等地的大量经济、政治、军事情报。一路上还探测航道、测绘海域图，并对各个港口的防务、商业等情况进行刺探，了解了清政府经济落后、布防及军备松懈等情况，为后来发动鸦片战争作了充分的准备。

郭士立到达上海时，不顾清政府的禁令，用了 19 天时间在上海搜集了大量的军事、经济情报。他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

“ [1823 年] 六月三十日 上海 我们巡视了[吴淞口]炮台的左侧，察看了这个国家的防务内部组织。炮台是一座极为巨大的结构。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了布置，可是最蹩脚的军队也能攻破它，因为他们不懂得炮台工事的技术，全部依赖于壁垒和围墙的厚度。……火药的质量低劣，炮的保养和使用都极坏，点火口太宽，制造得不合比例，我确信有些炮对炮手们要比他们所瞄准的敌人更加危及性命。由于中国长时期享有和平，所以，他们的军事工作已经陷于腐烂。……我们还巡视了兵营，……我们看到弓挂在墙上，没有发现箭，据他们说，箭存放在对岸。他们的武器极不一致，有些士兵有大刀，其余的有火绳枪，少数有矛，等等。他们所属的分队用大字写在他们的外套上。……大部分军官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是从部队里升上去的。他们的工资很低，收入极少，他们的地位一点也不值得羡慕。许多将官都是满人，享有极高的工资。同有些文官一样，只要中国的这种和平局面继续下去，他们的官职不过是一个闲差使。”

郭士立等人到吴淞口炮台刺探情报，遇有军人拦阻时，就拿出预先印好的基督教传教小册子散发，借口说是来传教的，以此掩人耳目而侦察防务。郭士立就这次侦察向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作了详细汇报。后来，许多鸦片商人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去推销鸦片。

为了使外国人更多、更方便地了解中国情况和鼓动殖民统治者对华战争，美籍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中国丛报》，成为殖民统治者侵略中国的喉舌。

1835 年初，《中国丛报》公然发出了战争叫嚣：“当为了取得公正、提供保护和维持一个国家的国格而有必要使用武力的时候，这样一种手段永远不会受到谴责。……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

1836 年初，《中国丛报》刊载了《与中国订约——一个巨大的迫切要求》一文：提出了使用武力迫使中国订还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该文写道：“最近在沿海的侦察证明，天朝的联合舰队无能力驱赶一艘只配备数名欧籍武装人员的商船。我们已经见识过一些他们自吹自擂的英雄们，可以断言，英国兵只要一个团就可以击退几个省的军队……”

“中国，虽然是一个辽阔的国家，有 3 亿 6 千万众多的人口，却是一个极端孱弱的国家。……采用低声下气的请求，我们必将一无可获；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在缔结条约时，必须重视获得使英国使臣能常驻北京的权利。要确定一个固定的关税，废止公行的垄断，完全准许我们在所有沿海有海关的港口和京城里通商……”

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前夕，利用《中国丛报》向西方列强提供了大量情报。

其中包括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地理、文化、气象以及从清廷到地方官吏的情况。特别注意报导关于中国的时事，中国进出口贸易数字，中国对英交涉的评述，译载重要文件如清帝上谕、大臣奏折，以及英、美商人对这些文件的评论等等。《中国丛报》在西方列强制定侵华政策中起着提供情报的作用。

此外，还有一些不知名的传教士，为英国侵略者搜集情报也是不遗余力的。有个传教士把吴淞江通往内地的航道图秘密送给英军。参加侵华战争的英兵曾供认：“我军从一些传教士方面，获得了不少消息，知道中国政府认为我军一定沿着白河，要向北京进攻。传教士传递消息说，自从宁波为我军攻陷后，清政府即用上一切力量，在预料我军所要进攻的道路上布防，建筑起各式各样的障碍物。清政府把天津看成是北京的一个海港，因而特别重视天津，希望将天津变成头等的防御阵地。”

这个英兵还说，居住在长城口外（属热河）一个驻有清军的边界镇市上的传教士，把当地许多村庄铸造的铁炮运往天津的情况密告英军。传教士与侵略者是息息相关、血肉相联的。英军对传教士的活动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传教士为殖民统治的扩张侵略提供了最早的信息和依据，成为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向导。鸦片战争开始后，他们跟随在侵略军身后，享受着侵略者用枪炮给他们带来的传教特权。

三、传教士的大量涌入与洋教的发展

早在明末清初，意大利、法国、荷兰、俄国等西方国家的传教士就已进入中国，建立传教据点，不过人数不多，活动的规模也不大。而 1840 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情况。传教士和侵略者密切配合，用欺骗和恐吓，刺刀和枪炮强迫清政府与侵略者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为传教士踏入中国扫除障碍，打开大门。他们举着十字架与端着刺刀的侵略军一起为殖民主义的扩张效犬马之劳。在殖民统治者的眼里“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他们认为“与其设立几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几个教堂更为有效”，“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驻扎传教士，就像在殖民地修建兵营，驻扎侵略军一样必要。”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侵略军实现了传教士们：“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的信念。美国长老会教士倪维思曾说：鸦片战争“是按神意用以开创我们与这个大帝国关系的新纪元。”

1842 年，清政府在战争失败后，被迫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条约的起草人就是一位传教士——小马礼逊。条约的中文稿出自于另一位传教士，那位搜集情报的能手——郭士立。英国侵略者的胜利使传教士们看到了“曙光”，他们认为是可以到中国城市的大街上，提高他们的嗓门大喊大叫的日子了。1842 年 2 月 14 日，一个传教士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给国外的传教士写了一封很“自豪”的信。信中说：

“大炮在天朝呼啸，……城市在征服者面前一座接一座陷落。……这是政治提出的要求，是大炮迫令其实现的。

一次我信步走到一个城门口，城墙上似乎永恒地写着：洋人莫入。……我是一个洋人，又是一个传教士，我看到了城上写的那句话，可是我不顾一

群在场中国人的惊诧，闯进了城门。

时候已经到了，我们已沉默到今天，现在是可以到中国城市的大街上，提高我们的嗓门大喊大叫的日子了。”

不仅如此，法国统治者看到英国借《南京条约》从清政府手中获得巨额赔款并占有香港，还享有五口通商、领事裁判等权利后，非常羡慕。法国传教士也蠢蠢欲动。1843年，法国传教士安若望就向巴黎发出呼吁：“法国屡屡参与其他并不重要的外交事务，不惜花费巨款，派遣舰队和军队，如欲为我们取得在华传教的自由，岂非轻而易举？”法国传教士古伯察也表示：“既然英国可以为了维护少数商人的利益，毫不迟疑地派遣军舰追偿几箱焚毁了鸦片的损失，法国的传教士受到迫害、残杀，法国为什么不可以进行有效干涉呢？”

1844年，法国用枪炮威胁清政府，迫使清政府和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可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以后，法国传教士便更加活跃了，也更加猖狂了。

与此同时，美国传教士也趁火打劫，利用清政府由于鸦片战争失败而产生的惧外心理，以武力威胁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其内容比《南京条约》更为苛刻：“除了传教士能在五口传教之外，还可以建立教堂。”这是基督教传教士得以在中国公开建立教堂之始。传教士们认为应该大踏步地跨入中国了。他们叫喊道：“（中国）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各自国内的差会，如果他们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18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

此后，大批西方传教士，举着十字架，与西方商品和资本一样，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进中国。

中法签订的《黄埔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可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使得长达百年多的教禁开始解冻。但是，条约还没有自由传教的规定。以后在传教士的要求下，法国政府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开放“教禁”，自由传教。1844年，道光皇帝下了一道手谕，对天主教准开教禁。其后，由于基督教各差会要求享受同等权利，耆英被迫于1845年2月下令准予一体适用。从此，天主教各修会和基督教各差会传教士纷纷前来中国，以通商口岸为基地，伺机潜入内地活动。因1844年，道光皇帝的朱批仅是传教宽容，并不允许教士们进入内地传教。清廷再三申明，传教士“只于通商五口地方建堂礼拜，断不越界传教。”所谓“断不越界”，是指不准逾越条约中所议定的各通商口岸的界址范围；即使是在口岸范围内传教，也必须是“以早出晚归，不准在外过夜为断”。对这种限制自由进入内地的规定，不但传教士不满意，就连西方各国政府也深为不满。为了取得深入中国内地的特权，以英、法为首的侵略者便设法寻找新的借口，酝酿发动新的战争。作为殖民统治者对扩张侵略的先锋、向导，传教士想方设法加深对中国内地的渗透。

在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下，道光皇帝在1846年2月20日发布上谕：“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尼居者毋庸查办之外，其原旧房屋各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此后，各国天主教的修会来活动。基督新教各差会传教士还云集香港讨论如何“进军”中国及划分传教区域范围等问题。不久，东正教也把外交职能和传教分开，由北京向中国各地扩大自己的传教势力范围。

但是，虽然传教士的活动较以前自由了一些，但道光皇帝的上谕里仍规

定了“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所以，为了更自由地活动，法国政府和传教士，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制造了多起教案的肇事者，便寻衅滋事，于1856年以法国传教士马赖在广西被杀之事为借口，联合英国发动了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以清政府屈辱投降，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而宣告结束。《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又进一步扩大了侵略者的特权。

据史料记载，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起，到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的15年间，天主教、基督新教违约非法潜入中国内地的至少有法国、英国、意大利、葡萄牙、美国、西班牙、德国等7国的传教士。其活动地区从黑龙江到广西，从山东半岛到青藏高原，从城镇到乡村都留下了他们活动的痕迹。

到1860年，基督教传教士从1844年的31人增加到100余人，教徒从6人增加到约2000人；到19世纪末，传教士增至约1500人，教徒增至约80000人。英国势力占主导地位。到19世纪末，英国传教士占50%。从19世纪80年代起，美国势力开始增强。到19世纪末，传教士增至全体传教士的40%，其余10%是来自西欧和北欧。

这时期，东正教也积极发展传教势力范围，并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教区。

天主教各修会同受罗马教皇的领导，从1879年，教皇里欧十三世划中国为五大传教区：第一区为直隶、辽东、蒙古；第二区为山东、陕西、河南、甘肃；第三区为湖南、湖北、浙江、江西、江南；第四区为广东、广西、香港、福建。

到19世纪末，在华天主教各修会的传教士共约800人，教徒从1860年的40万人发展到大约70万人。

四、披着宗教外衣的狼

马克思指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鸦片——大炮——传教士，是近代资本主义列强用来掠夺中国的三位一体的工具。19世纪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获得迅速发展，积极向海外寻找商品市场。传教士之所以被殖民统治者看好，是因为它还是一只很富有欺骗性和剥削中国人民以自肥的豺狼。

在法国对外贸易比较薄弱时，统治者就以大量派遣传教士弥补不足。他们用大量的金钱资助传教士们，用船把他们送到他们的势力已经到达和没有到达的地方。当时一些西方人认为，传教士对他们打开中国大门，进入中国的商品市场是非常有利的。他们可以紧跟着十字架的旗号，把商品输送到“传教士已经跨过的平原和土地上。”

在中国，西方传教士不仅用宗教这种“精神鸦片”毒害中国人民，而且还肆无忌惮地进行鸦片走私的罪恶勾当，并从中获得大量白银而发财。难怪他们的同伙也大骂他们是坏蛋，说：“他们来到中国，为着享乐，为着抓钱……”绝大多数传教士之所以乐于到中国来，是为了寻求“他们在各自国内或其家庭境况下所梦想不到的”奢侈与享乐的生活。因而，教堂、教会多也成为藏污纳垢、渔利侵权的罪恶之所在。

贩卖鸦片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打开中国大门的重要手段。从18世纪初，英国商人便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吸食鸦片可使人在精神上和

生理上都受到极大的摧残。鸦片的大量输入还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加深清廷统治的危机。鸦片贸易使清朝的吏治愈益腐败，军队更加失去战斗力，社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而白银外流，使清政府财政陷入窘境。清政府虽曾多次下达查禁鸦片入口的命令，但走私现象不仅没有阻止，反而愈益猖獗。

传教士的利益与贩卖鸦片是息息相关的。他们与鸦片贩子狼狈为奸，积极参与鸦片贸易的罪恶活动。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着贩运鸦片的“飞剪船”到中国去。他们还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乔装出慈善的面孔、唱着“圣洁”的“赞歌”向中国人民推荐吸食那些连教廷和他们本国政府都列入违禁使用的鸦片。他们欺骗人们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像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他们积极地推销鸦片去毒害人们。当鸦片的危害日益突出的时候，他们就又以救世主的面孔对人们说“只有基督能拯救中国解脱鸦片”，并还进一步说“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从而暴露了他们的狰狞面目。

鸦片战争中，传教士跟侵略军一起征战，以实现“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的口号。战争期间，英美等国传教士完全剥下了“基督圣徒”、“传播福音”的外衣，成为侵略军取胜的举足轻重的人物。那个搜集情报的能手郭士立，抓住清政府妄自尊大的弱点，让英国以“强硬”措施制服清政府。在战争中，他协助侵略军指挥作战，当有的百姓问他“如果你们真那么希望和平，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到这里来”的时候，他恼羞成怒，指使英军对老百姓进行残酷的屠杀。战争中，传教士还常常疯狂地勾引中国人背叛祖国。他们收买罪犯、流氓、赌棍充当侵略者的走狗。此外，还诱骗中国人入教，使一些不法教民助纣为虐，充当汉奸。当时有人指出，欲除汉奸，“非严究天主教不可”，因为“汉奸多奉其教也。”

从鸦片战争一开始到签订《南京条约》传教士都是直接的参与者。在中央谈判的过程中，郭士立和马儒翰都作为代表英国政府的全权代表璞鼎查对条约的具体内容与中方代表几次进行讨价还价。谈判中，马儒翰态度十分蛮横，扬言清政府如果不割让香港，不开放五口为通商口岸，英国政府就只能以战争来解决问题，其凶狠阴险之相一览无余。由于他们在侵华战争中很卖力，得到了主子的赞赏，马儒翰被任命为香港立法委员会兼香港殖民地政府的秘书，郭士立也被任命为香港殖民地政府秘书。

美国传教士在战争中也积极协助英军。在中美签订《望厦条约》时，充当订约使团的助手。传教士伯驾还利用清政府因战争的失败而产生的惧外心理。恐吓清政府代表，声称美国在中国水域停有军舰等着谈判的结果，另外还要再派几艘战舰来到这里听令，并打算北上天津。美国传教士就这样以欺骗和恐吓的手段，迫使清政府签订了比《南京条约》要更加苛刻的中美《望厦条约》。伯驾在条约签订后，也很受主子赏识，被任命为美驻华使馆的中文秘书。伯驾自然也不辜负主子的心愿，全心全意地为殖民统治者效力，功绩越来越多。1855年被任命为美驻华公使。

法国传教士在侵略方面是决不甘于落后的，在其积极参与策划下，法国用与其他侵略者一样的手段，迫使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

从《南京条约》到《望厦条约》再到《黄埔条约》，传教士都积极出谋划策，其侵略用心之凶狠与端着刺刀、架着大炮的侵略军相比毫不逊色。他们为自己的“伟大”成果得意非常。他们曾喜形于色地说：“上帝与这般人

民打交道，路总算打开了。”从此，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发生了不可分割的畸形关系。

在 19 世纪末的二、三十年间，传教士都曾大规模地出售过一种“戒烟丸”骗取钱财和坑害人们的健康。当时由于鸦片烟的危害，使大批中国人的健康受到损害，教会竟出售这种所谓的“戒烟丸”以欺骗购者说可以戒掉烟瘾。但这种“戒烟丸”经人化验乃是用吗啡和土豆粉混合制成的假药，服用这种假药不但戒不了鸦片，而且也是一种麻醉剂，起着鸦片的代用品作用。传教士也承认，“吗啡买卖就是鸦片贸易”，可是传教士不但自己推销，而且还发给教徒四出兜售，从中猎取大量不义之财，毒害了无数中国人。这就是披着宗教外衣的传教士作出的令人发指的卑劣行径。

基督教传教士总是向中国教徒们喋喋不休地讲“安贫乐道”、“以苦为乐”等基督教所标榜的“劝人为善”的宗旨，但自己却在中国过着天堂般的生活，享受着侵略军为他们带来的种种特权，饱尝着美味佳肴，交流着活动经验，游览了名胜古迹，踏遍了名山大川，冬天围炉取暖，夏天到避暑胜地，并不失时机地搜集情报，干涉中国内政。他们用中国人民的苦难，换取他们的利益。对此，一位基督教徒就无情地揭露了当时传教士的真面目。他说：

“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全世界一切地区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行为和不顾死活，乃是人世间任何时代、任何其他入种，不论他们多么残忍，多么无知，也无论他们多么狠心和无耻，都是无法跟基督教人种相比拟的。”

五、传教士无恶不作露真容

“劝人为善”是西方基督教传入中国时所标榜的宗旨，在各国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中，也都写上了这一条。但是，传教士都违背了其宗旨，依仗不平等条约，依仗侵略军的枪炮，在中国大地上抢占民宅，霸占土地，作奸犯科，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传教士取得了许多特权。但这并没有完全满足他们的野心。1846 年道光帝颁布了关于天主教堂“给还旧址”的上谕后，传教士又制造了一系列所谓“还堂”交涉，掠夺中国人民的房地产。“还堂”时，他们不顾实情，强迫人们给还。有的教堂，早年就已卖出，以后民间相继倒手转卖，已经不止一人了。有的还花费了许多钱财进行过维修。可是，传教士不仅不补偿其维修费用，还硬逼人家交还。还有的传教士看好了某一座房屋时，竟信口胡说是昔年的教堂，逼迫人们退还。

传教士还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根据准许进入内地和擅自添加的可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大批地深入中国腹地霸占土地。干涉内政和包庇教民。在江苏、江西、广东、山东、山西、河南、湖北、陕西、四川等地的十几个省区进行讹诈勒索，非法强占房地产。在山东济南，传教士还煽动教徒用暴力驱逐旧址大批居民，所强占的房屋地产，全部不给钱。在江南一带，传教士甚至连处所也不提，只提 15 个县府名称，强令地方当局勘址给还。

法国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孟振生唆使法国侵略军总司令替他索回北京东、西、北三处教堂。孟仗势蛮横无礼，乘坐绿呢轿，在许多教徒的骑马护

卫下，耀武扬威，俨然如官府大吏一般，到奕訢处迫使其交还教堂地基。他们不管三处教堂地基上的居民有无搬迁的困难，强令他们收下象征性的赔偿费，立刻搬迁。可见传教士的专横跋扈。

为了永久地占领中国，扩大传教范围，传教士就采取种种手段霸占土地，“谋田地房产”。

强迫捐献 传教士还对有房地产的教徒采用宗教语言强迫他们捐款，答应他们死后可在天堂居住更大的房屋。捐不起房地产的，也可捐些教堂内的设备等物。

山东德州某地有一妇女，因在灾荒年代向传教士领过一点救济，就在传教士的花言巧语下立了愿将她的房地产捐献给教堂的契约。也是在德州，一个叫石家塘的地方，传教士哄骗当地的人民将一座庙宇捐献给了教堂。传教士就是用欺骗的手段，骗取人民的财产为己利用。

盗买盗卖 传教士通过不法教徒盗买公产和亲属产业后，再转手倒卖给教堂。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于 1887 年在山东谎称已征得出租人的家属同意盗买了大片土地。其实该出租人当时正在狱中服刑。后来业主家属上告地方官吏。地方官迫于美方压力，只好将济南城外一块比李佳白强占的产业更大的土地拨给他作为补偿交换，才“圆满”解决此事。

低价勒索 传教士常以低代价买进大片土地。1876 年至 1879 年间，华北闹灾荒之时，传教士趁人之危，以低价收购逃荒之人的土地。而到了灾荒过后，逃难归来时，人们已无钱赎回，只得全家入教充当教堂的佃农维持生计。1894 年，英国传教士以极其低的代价，花 60 两银子就租到江西庐山牯牛岭地区的一大片辽阔的公有土地，并辟为他们的避暑胜地。此外，传教士还以永租的方式取得了莫干山、北戴河、青岛、烟台等旅游、避暑胜地。

占领垦地 传教士主要在内蒙一带采用的手法。内蒙古著名的 24 顷地大教堂，是传教士于 1877 年占地兴建的。到 1887 年又在周围扩占地达 1 万亩之多。据有关文献记载，当时向蒙古王爷租地时，都不实际丈量，一般是骑马巡视一遍，说十顷百顷都可以。

传教士霸占土地后，除用于教堂及其附属机构外，其余就让教徒耕种并进行剥削。传教士还要他们提供鸡鸭鱼肉、蔬菜瓜果供其享用。此外，还令教徒从事建造教堂、修筑圩寨、拉柴赶车、挑粪种菜、喂养牲口等无偿劳动，还利用青壮佃户充当教堂武装的打手。如不履行以上义务，传教士就用罚款、罚送匾、送酒、刑责、收回土地或开除教籍等惩办佃农。

传教士作为殖民统治工具进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们通过享有的“特权”以教堂为堡垒，以教徒为臣民，成为地方的权力中心，成为“国中之国”，成为在殖民统治者“保护之下广泛散布在中国各地的独立王国”。他们干预地方政事，藐视地方官员，疯狂地聚敛财富，侵犯百姓利益。

在“还堂”“夺产”、兴讼等民教纠纷中，教士不问是非曲直，一意庇护教民，威胁地方官，就连中国籍教士也依势大耍威风，咆哮公堂。因此，一些地方官为保身家仕途，“见教士则若天神，视平民则如鱼肉”。外国传教士见此情态，就更胆大妄为了。他们唆使教棍侵民财产、迫人入教，强买占卖，毁人坟茔，夺妻霸女。非教平民、士绅遭其荼毒，破产人亡。在有些地方，传教士还私设公堂，拘押群众，酷刑逼讯，以“一府长官自居，任何人不能过问。”他们有的还穿官袍，头戴花翎，乘官轿，骑花马、使教徒随

其左右，前呼后拥，鸣锣开道，以清朝官员大吏自居，招摇过市、狂妄之极。

然而，政治上的“特权”还未满足传教士掠夺中国财富的妄想。中国的黄金、白银、古玩使他们把传播“福音”的信念抛得无踪无影。他们充分利用列强的枪炮为自己谋取更多的特权，以便更方便地聚敛财富，并且还擅自经营商业贸易进行各种非法活动。他们贩卖鸦片，出租房屋土地。他们收取高额租费，却又拒交赋税。他们欺骗是好手，霸占民宅土地是好手，经商理财，坑害人民也是好手。他们建旅馆、开饭店、放高利贷，盘剥教民和非教民，侵民利，发民财，然后带着大把大把的银子回欧洲享受去了。一些华籍教民中的无赖地痞之类也仗势巧取豪夺，搜刮民财成为富商或大地主了。

在华籍教民中，有的之所以入教，是因为受到传教士的宣传，接受了其宗教信仰而成为真正的虔诚的信徒的，他们通常是比较善良的；有的则是无所谓信仰不信仰，只是因生活贫困，又经传教士的欺骗和多方引诱之下才入教的；有的则是作为传教士的打手和走狗而被收买的地痞流氓等社会的渣滓；有的则是依仗教会势力保护个人或家族利益的，多数为地富土豪之流及一些地痞流氓之类。

传教士涌入中国，向全国各地渗透，建教堂、置地产，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什么“福音”，反之，他们在中华大地上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干尽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坏事，既危害了清政府的统治利益，也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灾难。洋教士就是这样的一批凶犯、恶棍！在他们的欺压之下，人民“至宛转求生而无可生”。最后，“隐忍有四十年余”的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只有一拼求生存。于是，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反洋教运动”。

六、发出反洋教呼声 掀起反洋教运动

鸦片战争后，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政府迫于侵略者的压力，准开教禁，允许归还先前查封的天主教的教产。侵略者的阴谋一步步得逞，气焰也一点点高涨。教会和教士与中国人民的矛盾也一步步加深。因而，全国上上下下都发出了反洋教的呼声。

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着一句俗语说：“未入教，尚如鼠；既入教，便如虎。”传教士及其教徒完全变成了社会上的特权阶层了。教士的蛮横和盛气凌人的态度，把不少地方官员、士绅得罪了。封建官绅把洋教称之为邪教，并揭露了其罪恶活动，发出了反洋教呼声，敲起了反洋教运动的锣鼓。

封建官绅认为传教士就是用不平等条约来保证他们掠夺中国财富，用传教来笼络人心。百姓一旦受骗入教，就心中只有教主而没有了国法。这样就会影响和动摇他们的统治。而传教士力量强过官府，百姓与教民发生纠纷告到官府时，传教士往往不问是非，庇护教民，并与官府作对。从而使一些善良的百姓有屈不能伸，也以入教祈求躲避其他伤害。统治阶级认为允许传教，时间长了就不仅仅会诱使平民百姓入教，而且朝中的人也会受其影响而入教的。还有，洋教盛行必然会极大影响和削弱孔孟之道，危机几千年来的中华民族的正统的儒家思想。随着传教士的势力越来越大，百姓及其一些官吏都不敢惹他们，他们担心如此下去，以后如果和外国稍有不和时，谁还敢解决。所以，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发出了反洋教的呼声，以“保卫圣道”、“排斥异端”。

驱逐洋教的运动从偏僻的贵州兴起。在我国贵州，传教士的活动也渗入

到这里。由于他们胡作非为，倚恶仗势，从而与当地百姓不时产生磨擦，发生纠纷，相互矛盾逐渐加深，教会势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打击。不久，神父胡缚理又多次在六冲关和青岩镇地区强买土地，建造修院和印刷厂，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抵制并在人民的心中埋下仇恨的种子。

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传教士享有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从而更加狂妄无礼，不可一世。1861年4月4日，神父胡缚理竟手持法国驻华公使馆寄来的“传教士护照”，乘坐一台紫色大轿，肩披紫带，在100多名教徒的簇拥下，大摇大摆地在两旁行人的注视下，来到巡抚衙门。向巡抚提出承认教士在内地传教自由和保护天主教在贵州的“合法”权力。巡抚何冠英见他傲慢无礼，心里很不痛快，说：“现在省里情况不是很好，外出传教肯定会不方便的。并且贵州的教门已经很多了，没有再增加的必要了。如果今后在教徒中发生了违法乱纪的事情，你们不能不承担责任。”胡缚理没想到碰了一个大钉子。但他还不甘心，又转身乘轿去见提督田兴恕。但是，田兴恕根本就未见他。田兴恕早就对传教士的行为气愤不已，他想借群众对传教士的仇恨心理来把洋教赶出去。

田兴恕向贵州省各地发出“秘密公函”，令各地如果遇到来传教的人，随时把他们驱逐出去，不能容留他们。如果能借故“处之以法”那就更好了。同时，他还多次派人搜查教堂，抄走各种宗教用品。当人们知道了秘函的消息后，就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反洋教的斗争中去了。

端午时节，青岩镇各族人民按传统习惯到郊区野游，路过姚家关天主教堂时，与修士、教民发生争执。团首赵畏三一怒之下火烧了天主堂大修院，逮捕了几名教徒。并在田兴恕的指令下，把张文澜等三名修士和一名厨师秘密处死。胡缚理幸免逃走后，急向法国驻京公使报告，并提出赔款、护教、惩凶三项要求。法国政府向总署提出“抗议”。

正当双方紧张谈判的时候，开州（今贵州开阳县）又发生了民教的争执。开州因民教争执而发生的教案，是天主教徒对青岩教案久议不决而进行的报复行动。1862年正月15日，开州夹沙地方欢度元宵节，按习惯每户应出捐搭龙灯、祭龙神。法国传教士文乃尔怂恿教徒们抗交，于是发生了冲突，几至动武。团首周国璋、开州知州戴鹿芝早就对教会不满，他们在田兴恕的批示“缉案就地正法”的指令一下，于正月里就把文乃尔和4名抗捐闹事的教民逮捕处死。

一案连着一案，法国公使大为恼怒，联合英、美、俄等国公使，一齐向清政府提出了“强硬抗议”，并以武力相威胁，要求赔偿一切损失和处死田、戴、赵三人，并严惩一切对洋教保护不力或查处不严的有关官吏。

在长达3年的外交谈判中，清政府终于屈服在列强的压力之下，将田兴恕发配到新疆充军；提督衙门拨给天主堂使用；两处教案共赔偿白银1.2万两。除戴鹿之、赵畏三、何冠英已死不予追究外，其余有关人员或交部议处，或革职，或充军发配。

列强各国和传教士获得满意的结果后，“胡缚理深为悦服。”但是，把闹教的指挥部、全省军事首脑机关——提督衙门给天主堂使用，却极大挫伤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一场惊心动魄的贵州教案就这样在列强的压力下，在传教士满意的笑容下结案了。

在安徽也发生了民教纠纷酿成安庆教案。1869年初，法国天主教教士韩石贞，英国内地会教士宓道生、卫养生等进入安徽安庆后，以低价半买半租

民房 15 间，改为教堂，引起了安庆人民的极大不满。

当湖南反洋教揭帖流传到安庆时，引起了人们很大反响，深受鼓舞。揭帖内容揭露了教会的罪行。内容大致如下：（1）教会不敬祖宗神佛，惟知上帝。入教的一定要毁掉祖宗牌位，遇到庙宇就拆除掉。（2）教堂以甜言蜜语勾引男女，卖给洋人，甚至远送到南海一带，充作渔人钓饵，引诱人们。（3）洋人和一些民族败类在条约的庇护之下，经营商业，进行各种贸易活动。他们不受关卡的检查，通行无阻。教士分布在各个角落，搜集情报。揭帖认为，如果邪教盛行，孔孟之道削弱了，那世界就不知会成为什么样了。因此号召“凡我士农工商，务必敌忾同仇，群起报复。”

揭帖流传到安庆时，正是府院考试的时间，文武考生都集中在安庆府。这些考生因平时所学习的全是诗书义理，与教会反对崇拜的教义是截然不同、水火不容的，因而有着浓厚的反教思想。这期间，在安庆考场附近出现了一张匿名揭帖：“匪教猖獗，与考童为难，于初二日拆仁爱堂。”这样一来，使反洋教的空气更紧张了。安庆地方官见形势紧张，就嘱咐教士别在学生考试期间外出了，以免发生纠葛。然而，狂傲之极的教士根本没把地方官的嘱咐当回事，仍我行我素。11月3日，英国传教士宓道生、卫养生不听劝告，乘轿来到府署，要求道台查办散发反教揭帖之人。当时府署里正在举行考试，教士一进府署，就被考生拦住，并把宓道生和卫养生两人的乘轿掀翻，高喊“杀洋鬼子、打洋鬼子”。教士见情形不对，就赶快跑到府署呼救。考生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们和一些群众冲进西右坊英国教士的住处，砸毁了家具，捣毁门窗器具。同时，东右坊法国教士韩石贞的住宅也被大批愤怒的群众捣毁，并搬迁一空。教士韩石贞刚刚启程赴上海，此时听到住所被砸就赶快回来，直奔府署，要求道台赶走那些愤怒的人们，并赔偿损失，保护教士身家性命。安庆地方官因为传教士来到安庆时，就仗势强占民宅，霸占土地，并将教堂盖在衙门附近，而心怀不满。继而教士不听他们的劝告，闯进衙门，导致事件的发生，地方官就更为不满。所以，地方官对英法传教士的要求，故意拖延办理。当晚，群众又拥入教士住所，捣毁了其它物品，并撬开房地地板，拆除砖壁，将宓道生的妻子打伤，并声称要烧了屋子。韩石贞见状不妙，急忙从后门逃了出去，连夜乘船跑到上海。

安庆事态扩大后，道台、知县也不敢再借故不管了，但也不愿镇压闹教的群众。所以，当韩石贞逃跑后，就接受了宓道生、卫养生要求护送离境的请求，在次日晚上派两只小船将他们二人及家眷送到九江。

宓道生、卫养生到达九江后，立刻向英驻华公使阿礼国作了报告。对安庆群众反教的事实经过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阿礼国听后，急忙赶到南京，要求两江总督马新贻惩办肇事者，并赔偿教堂、教士的损失。马新贻因为考生考试还没结束，而且群情激愤，如果立刻严办，就可能会激起更大的事端，所以请求阿礼国等些日子再进行处理。阿礼国执意不从，准备以武力相威胁，在安徽巡抚英翰的劝解下，方同意待事态平静后，再行办理。

由于法国借口四川酉阳、贵州遵义教案，向总理衙门进行勒索，并以武力威胁。总理大臣奕訢怕英法再次联合进犯北京，便下令马新贻速与英法公使谈判。结果清政府赔偿损失 4000 元，并任教士在安庆城内指定一地，由官方买给教堂和出示申明条约，保护教士及严惩由宓道生、卫养生指定的“祸首”。

七、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从 1861 年贵州首先驱逐外国传教士开始，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怒火迅速燃遍湖南、江西、四川、江苏、安徽、河南、直隶、内蒙、云南、西藏、福建和台湾等省区。1870 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传教士在天津建立教堂后，他们就以慈善为名，大批收容幼孩，甚至收买幼孩。一些被传教士收为教徒的地痞流氓，四处拐骗儿童，使天津丢失小孩的案件接连不断。天津有小孩的人家整日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

1870 年，天津连续破获了几起拐卖小孩的案件，全与教堂有关。案犯张栓、郭拐供认是修女让他们干的。另一女犯武兰珍供认是受教民王三的指使拐骗小孩的。并说共有 8 个人在拐骗小孩。人们知道此事后，极为气愤。他们要求地方官惩办案犯。6 月 19 日，天津地方官带着受害家属的呈文，找法国领事丰大业控诉，并要求搜查教堂。丰大业不仅矢口否认，且态度还极为蛮横。侵略者的嘴脸使天津人民无法忍受。他们在大街小巷里贴满了控诉侵略者罪行和要求惩办罪犯的揭帖。

1870 年 6 月 21 日早晨，天津主要官员在人民的支持下，按事先双方的约定到教堂查看对质。可是，教堂却隐藏了罪证，致使无法查看对质。在这期间，教堂里的教徒竟然仗势与前来探听结果的群众逞凶，双方发生冲突。丰大业让通商大臣崇厚派兵来驱赶百姓，但是，崇厚却只派了几名巡捕。丰大业见了十分恼怒，手提双枪与手执利剑的秘书一起去找崇厚。

当丰大业气势汹汹地来到通商署后，一边用剑朝桌子上胡劈乱砍，一边朝崇厚大喊大叫道：“乱民想要我的命，我就先要你的命。”说着举枪就向崇厚开了一枪。崇厚一闪，子弹擦肩而过。这时，已气极败坏的丰大业又朝着崇厚手下的人乱砍，并劈毁屋内设施。之后，怒气未消的丰大业准备回到领事馆，崇厚见外面百姓都满面怒容，怕再出什么事，就劝他别回去。但是，骄横惯了的丰大业毫不在乎地说：“我不怕中国百姓。”扬长而去。此时，正遇天津知县刘杰迎面走来，丰不由分说，抬手就向刘杰开了一枪，打死了刘杰的随从。丰大业的秘书也举枪向群众射击，猖狂到了极点。积忿已久的群众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群起攻向丰大业及其秘书，并打死了他们。紧接着，又鸣锣把群众聚集一起，火烧了侵略者侵占为领事馆的望海楼和河楼教堂，杀了里面的洋人。之后又渡过浮桥来到天津东郊，救出了仁慈堂中被教士收容和拐骗的幼孩，杀死修女，火烧了教堂。一路上，他们高喊：“杀洋鬼子，先杀法国鬼子。”天黑回来时，他们又拆毁了英美的 4 处教堂。

在这次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中，激愤的群众共杀死了 1 名法国领事，3 名随员，法国教士和修女 12 人（内有其他国籍人员 4 人）法国居民 2 人，误杀俄国居民 3 人，焚毁法国天主教堂 2 处，法国领事馆 1 所，并毁坏了英美教堂 4 处。

教堂收容幼孩，也收容成人。这些幼孩和成人是“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被传教士虐待而亡。教堂常常趁黑夜将死者草草掩埋。在焚烧教堂的当天，仍查出剩下的活人约有男女 150 余人，幼孩 80 余人。

天津教案发生后，驻北京的法、英、美、俄、比、德、西等 7 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以战舰结集天津海口及烟台一带示威，逼令清政府“惩戒中国官民”。法国海军提督甚至疯狂叫嚣：“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天津郡作为焦土。”法国公使罗淑亚赶到天津，对清政府大肆进行要挟，

提出种种苛刻条件。要求赔款白银二三百两，要求杀死天津提督陈国瑞、及天津府、县官员张文藻、刘杰 3 人以抵命。昏愤虚骄、一向媚外的清政府在列强的威胁下，急忙调派正在保定养病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到天津处理此案。最后，他们拟出了一个“正法之犯 20 人，军徒各犯 25 人”的名单。而这些被杀害的群众全是挺身而出保卫天津安全的无辜百姓。天津知府、知县被革职充军到黑龙江效力赎罪，赔偿抚恤费 50 万两。并派崇厚赴法国道歉。

曾国藩虽然对外妥协，惧怕列强，但他也十分清楚天津教案的真实经过。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凡教中案犯，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是非，曲庇教士。……平民愤郁愈甚。”并说：“百姓与他们发生争斗，实在是丰大业对官吏开枪所至。”

天津教案以清政府屈辱投降和无辜群众被杀而结束。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沉默，他们继续进行反侵略、反洋教的斗争。在天津，百姓把侵略者的罪行和人民的反洋教斗争等印成宣传画传扬出去。还有将图画印在扇面上，流传市面。天津人民对 20 位为教案而殉难的牺牲者，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在牺牲者被害的那天，群众沿街游行，在队伍中扮有数目相等的无头鬼，从教案发生的浮桥的旧址经过，穿过天津城与望海楼之间横跨海河上的金钢桥，到牺牲者就义的刑场。人们称 10 月 19 日为“鬼节”。

天津教案以侵略者获得满意的结果而结束了。而那些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在发动了官役、兵丁、团勇等其他阶层的人们起来驱逐侵略者，反对洋教的运动后渐渐地退了出去。但反洋教运动已卷入了越来越多的下层群众，反洋教运动并没有因他们的退出而停滞，仍继续向前发展。

八、反洋教运动进一步扩大

天津教案之后，教士教民不仅蛮横跋扈，依然如故，而且还变本加厉。那些最初支持人民进行反洋教斗争的封建统治阶级中上层人物退缩下去，但是，人民没有对侵略者让步。在四川南充、营山、内江人民联袂奋起，到 1876 年，则涌现了以邻水、江北厅、涪州为中心的斗争高潮；和四川的斗争相呼应，广东、山东、黑龙江、福建各地的斗争接连不断。

在 1858 年的时候，重庆人民对传教士强占民房、修建教堂的行为十分愤怒，并捣毁教堂及教士的住宅。结果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无力，既赔款又让地，把在川东广修教堂的权利全交给了川东主教。从此，教会势力遍及川东。川东遂成为多事之地。邻水、江北厅、涪州等地都有不法教民欺凌百姓的事件发生，民教纠纷接连不断。

1876 年初，邻水教民王同兴纠结教堂，黑夜抢劫，杀人害命，官府也不敢管。百姓互相联络，准备驱赶教会。行动开始后，大家积极参加，把大批为非作歹的教民被驱逐出境，捣毁了县城内外教堂并焚毁了百余家教民房屋。邻水的反洋教斗争很快蔓延到江北厅、涪州等地。

江北厅离邻水很近，在教会指使下，不法教民唐昌久、黄节耀等气焰嚣张，干了不少坏事，侵犯当地士绅、团首、百姓的利益，危害人们的安全。1875 年，团首陈子香、聂钦斋等发起灭教倡议。邻水的反洋教斗争鼓舞着他们集合乡民千人，手持枪炮等器械，怒吼着冲向教堂并烧毁了教堂，有 300 余户教民遭到攻击。陈子香等人还在城墙处设点进行盘查，并设立刑具以进行惩罚或随时处死。他们提出“斩决唐昌久、炮烙黄节耀、冉武氏”的口号，

给教会侵略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不久，涪州百姓在他们的激励下，由张在初等人率领，一举焚烧了各处教堂及教民房屋 100 余家。几个月后，数千百姓头缠红巾，摇旗呐喊，冲到州城，烧毁城内外所有教堂，赶走教民。

三地教案发生后，教民跑到川东教区主教范若瑟处控诉，说江北厅道府、军督借故不管理。范若瑟随即通过驻京法使馆向总署施加压力，进行议结。最后仅赔款就达 2.9 万两。邻水、涪州也按教士的意图赔偿 3 万两。

邻水、江北厅、涪州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摧毁了天主教在此经营多年的侵略阵地，狠狠地打击了列强们的嚣张气焰，从而使这一地区 10 年民教“相安无事”。

随着反洋教运动的发展，各地的斗争交相呼应，到处都是攻击洋教的活动，连北京正阳门外等城墙上也张贴了攻击洋教的告白。在福建，反洋教运动更加高涨。教士一出门就受到人们的围攻。教士如果到了乡村，农民就更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传教士就像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1847 年，美国传教士在福建延平县（今福建南平市）强行建堂。但被群众于 1875 年和 1876 年两次拆毁，并驱逐传教士出境。联甲总局绅董发布公启，指责教会蛊惑人心，败坏风俗，是当地一大危害。号召百姓准备些器械，互相保卫，不管教士走到哪里，都一定要把他们驱赶出去。在当时，各个店铺都插有“齐心保甲、驱逐番责”的旗帜。大家团结一致，齐心协力阻止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1876 年至 1879 年间，建宁、福州、福清连续发生焚毁教堂、洋楼和殴打教士的事件。在福州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公开张贴告示：“禁止信教之人来买食物。”可见群众对洋教是多么的厌恶。

1879 年 12 月，美国传教士为了扩大教会阵地，以开书店为名在延平开办福音堂。附近小孩前往观看时，“慈善”的美国传教士嫌小孩们嬉笑吵闹，竟开枪射击，结果打伤路人胳膊。枪声一响，警觉的人们立即冲到这里，痛打这帮横行的教士，并砸毁了“书店”内的一些设施。这些被围打的传教士，直到地方官赶来时才得以逃脱。

延平事件传到福州，美国领事威胁闽浙总督派人到那里处理此事，抓住“凶犯”。这时，原来领导了驱逐洋教斗争的联甲局绅董们纷纷贴出告示，决心抗争到底。在告示里，他们揭露了传教士的罪行，说传教士们诡计多端，居心叵测，他们用鸦片毒害人们，掠夺民财。他们租买土地，盖洋楼、建教堂，招收地痞流氓作为爪牙。百姓对他们是恨之入骨，与他们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告示里还告戒清朝官员和地方的富豪乡绅，如果知道洋人的不好之处，应当据实回复给上层才算得上是中国的官员，百姓也会欢迎的。如果只听洋人的一面之词，从而倒行逆施，即使讨好得了高官，也是没脸面见人的。这种人与宋代的大奸臣秦桧没有什么区别。在另一份告示中，他们还更进一步指出：“真不平，真不平，天朝官竟帮了洋人……他要拿闹事者，个个都是为首人。我们议定有一法，每户各自出一丁。南平四万八千户，共集四万八千人。备盘货，即起程，一概齐到福州城。求各宪，把冤伸，先要拿他放枪人……各宪若凡不肯理，拆洋楼，杀鬼子，并杀教民。一言即出，决不停留。那时候，不受洋人荼毒，亦不受官长欺凌，皇上也出气，百姓也欢心。若非如此斩尽，地方何能安宁？”

1884 年，中法战争爆发，结果法国竟不胜而胜，中国以不败而败。中国人民的旧仇新恨交集人心。群众斗争情绪更加高涨。反洋教运动中反帝国主

义侵略的色彩加强了，民众已朦胧地感受到国家与民族正处在危亡之中。

九、反洋浪潮势如潮涌

中法战争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列强在中国的势力不断扩大，各地的反洋教运动如波涛一样，汹涌澎湃。斗争的形式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由一般的骚动、暴动而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和武装斗争。封建统治阶级无论是上层或中、下层，基本上都已退出了反洋教运动，甚而成为帮凶。

1891年，长江流域一带传说天主教堂拐骗儿童，残害儿童。这些传说传播到安徽芜湖，点燃了多年来积聚在人民心中的怒火。5月10日，有2个天主教堂的女修士（华人）外出探视病人。因有一家患传染病，家中的两个小孩就被他们带回教堂。在路上，遇见两个小孩的亲属，要抱小孩回去，女修士坚决不让。双方发生争吵，围观的行人越来越多。他们纷纷指责天主堂拐骗儿童、残害儿童的恶劣行径，并把他们押送到保甲局，要求惩办。保甲局又送至县署。此间，传教士得信后就直赴县署，强迫知县释放了2人。于是，群众极为愤怒。5月12日，又有一妇女到鹤儿山天主堂，要求领回寄养在教堂附近育婴堂内的小孩。愤怒的群众手拿小手旗围集在教堂前，要求驱逐传教士。知县得讯亲自来驱散群众，并拘捕一人。然而群众并没有被吓住，仍旧聚集一起，冲进教堂，把教堂、育婴堂及其教士住所焚毁。当晚，百姓又转向江边的英国领事公署。芜湖关道台成章怕事态扩大，赶快领兵把领事公署保护起来。群众又转赴海关及海关职员住宅，海关人员持枪抵抗，同时，安徽府台也开枪威胁，不得已，群众才散退回去。

芜湖教案发生，两江总督刘坤一急派兵船增加勇营开往芜湖镇压，同时又派官员到英领事署道歉，并示立即查办。

芜湖教案只与英法两国有关，但列强侵华的利益是一致的。美、德、意、比、西、俄等7国驻华公使，也与英法联名，向清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联合向清廷施加压力。清政府立即镇压了芜湖反教人民，把斗争坚决的王光金、博有顺2人定“匪党”，审也不审，就杀了。然后又将2人的首级送到江宁、镇江、上海等地示众。其他被捕人员，也分别按他们定的罪行轻重，进行了处置。此外，清军还加派力量驻防芜湖，保护外国传教士及侨民，镇压芜湖人民的反抗。

事后，天主教堂借口教堂被烧毁，需重新修建，指定要芜湖风景区八角亭一带，企图霸占包括八角亭在内的全部鹤儿山地区。消息传开，引起了芜湖人民的极大反对，他们喊出了“国家土地虽尺寸，不能轻易割让”的口号，并准备不惜流血保护这里。群情激愤，法国也怕引起人民更大反抗，不得不放弃了霸占全部鹤儿山的企图。借此事件，侵略者向人民勒索了白银13万两。但是，芜湖人民也以团结而坚决的行动，从帝国主义的魔爪中夺回了自己的乡土。芜湖教案吹起了1891年长江流域人民反洋教运动的号角。

受芜湖人民反洋教斗争的鼓舞，反洋教斗争在江苏、江西、浙江、湖北各地的人民中迅速地开展起来。连上海租界及徐家汇一带，也出现了攻击洋教的匿名揭帖。武汉两岸，“洋街洋堂，人人自危”。帝国主义分子万分恐慌。美国驻华公使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说：“所有外国在华的可以出动的炮舰都动完了”，“我们惧怕……没有一个城市是安全的，上海也包括在内。”

这次巨大浪潮的余波一直持续到 1893 年。

随着列强的不断入侵，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腐朽没落的清政府极近奄奄一息。仰外国人鼻息行事使其向“洋人朝廷”大大地迈了一步。

1895 年端午节，成都人民按照传统的习惯，在东教场撒李子。忽然有人传言附近的四圣祠教堂有洋人杀小孩，于是群众蜂拥至四圣祠，将教堂捣毁。之后，又分别到平安桥及北门外，将法国教堂捣毁。当晚，群众散去。各国传教士纷纷逃往新都躲了起来。新都群众也准备响应成都民众攻打教堂。知县知道后，忙派军队把教堂保护了起来，攻打教堂之事未成。

成都教案的发生，只是捣毁了法国天主教堂，但英、法、美三国都共同逼迫清政府镇压人民的爱国运动，逼迫清政府对那些不用大力镇压人民的官吏进行处分。英国政府竟说：“中国如果不给四川总督刘秉璋以相当的处理，就立刻派兵船到华海口报复。”于是，英、法、美共同出兵，派出 8 艘军舰到长江，威胁和恫吓清政府。清政府按着侵略者和传教士的旨意，将四川总督刘秉璋，候补道周振琼、成都知府唐承烈，华阳、乐山等几个县的知县全部革职，朱瑞亭等 6 人被杀害，另外 17 人充军。

成都教案发生后，英、美与法国共同出兵威胁清政府，证明了传教士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的政治、经济、军事是密切相关的。而清政府按照侵略者和传教士的意愿从严处理这起教案，在没有传教士被杀的情况下，杀了 6 名有身分的人，并将上至总督，下到知县 20 多人革职罢官，交刑部处理等，表明了清政府已是苟延残喘，任听洋人摆布的架子了。它的唯一一点力量也就是如何对待和屠杀那些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群众运动了。

在南方，在沿海地区，人民的反洋教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在北方，在内地其他地方，人民的反洋教运动也如汹涌的波涛，强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

1891 年，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引起了热河东部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并发生武装起义。

早在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就已渗透到热河地区。在这里，外国传教士、教民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无恶不作。并且，他们和地方官吏、蒙古王公勾结残害人民。传教士利用教堂拐骗和杀害儿童。蒙古王公和地方官吏对当地贫苦百姓肆意勒索、欺压。热河东部人民生活极为艰难。双重压迫和残害使他们忍无可忍，终于掀起了一场“仇杀天主教，仇杀蒙古王公，仇杀贪官”的人民武装大起义。

10 月初，熬汉贝子府准备血洗扬弯子。民间秘密结社金丹道的首领杨悦春，趁蒙兵未到，举行起义，拿下贝子府。在这里建立了开国府。杨悦春被推为开国府总大教师，并发布了安民告示。

热河东部各地人民闻讯也起来响应。在理教首领郭万昌率众数千人首先响应。接着有 10 股队伍也相继起义。各路起义军连续攻下几个地方。其中一路义军直逼朝阳，攻入县城。另一路军在平泉州的榆树林子伏击，消灭了前来镇压的部队。从开国府出发进行北伐的一路义军，所向披靡，连克五旗后，扑向赤峰。

在建昌一带，在该地金丹道教教首傅连信、佟杰等率领下，也于 10 月中旬在建昌松岭子镇举行了起义。他们首先捣毁了附近的天主教堂，并在在理教首领林玉山率领的起义军配合下，攻入了平泉州州城，火烧了外国教堂数

处，然后直取建昌城。

这次大起义攻占了热河东部的和（泉）、建（昌）、赤（峰）、朝（阳）4州县，完全摧毁了清王朝在这个地区的统治，直接威胁着热河省城及清王朝的发祥地之一的奉天。清政府慌忙派军队分两路围剿起义军：一路由统领左宝贵率奉省官军，从东向西围攻；另一路由李鸿章督办，命叶志超统大批精兵由南向北进攻。同时，教会、传教士也与清兵并肩作战，一起镇压起义军。

到10月底，清廷与教会勾结，在理教首领郭万昌被杀。东、南两路起义军失败。到11月底，西、北两路义军也被清兵打败。起义军重要首领李国珍在转移途中不幸被俘，英勇牺牲。各路起义军相继失败后，其余部仍继续作战。他们退回开国府，准备在那里与清军展开最后一战。但由于寡不敌众，开国府很快陷入敌手，起义军的主要首领力战而亡，千余名起义军拒绝投降，全部战死。杨悦春也被俘遇害。

历时两个月的热河东部人民大起义，就这样在清政府和教会的绞杀下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的统治，在近代中国的反洋教斗争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十、反洋教运动如火燎原

随着反洋教运动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逐渐地退出了反洋教的行列，人民群众也逐渐觉醒并认识到：每一次反洋教斗争都是以清政府对人民的残酷镇压及对帝国主义者的赔偿道歉而告终。洋教和帝国主义是紧密联系的。因而，他们自觉地把宗教和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自发地把反对教会侵略和反对列强瓜分逐步结合起来。反洋教运动日趋激烈，反洋教斗争一呼百应，如星火燎原一般，规模也越来越大了。

人民群众勇敢地起来反抗外国侵略，抗击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驱逐深入内地的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

在山东曹县，大刀会首领刘士瑞率领当地人民攻击教堂，驱逐洋人，其声势浩大，影响及于鲁西南和江苏的丰县、沛县、肖县、砀山等地。

在巨野县，当地人民于1897年11月攻打磨盘张庄德国天主教堂，杀死德国传教士2人。济宁、寿张、菏泽、成武等地的大刀会纷纷响应，斗争此起彼伏。

1898年，广西天地会起义，一度攻占郁林等地，并发出檄文揭露教会罪行，要求官民一致对外，洗雪国耻。

同年，在山东郯城神山和沂州、日照、兰山等地也爆发了大小武装起义十多次。德国从青岛派兵到沂州，勾结当地官吏，共同镇压了这些斗争。

在“巨野教案”发生后，德国也像先前的其他列强一样，以此教案为借口，悍然发动了对中国的武装进犯。他们借传教士的尸首，从事讹诈，出兵占领胶州湾，又逼迫清政府惩办“凶手”，将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赔偿教堂“损失”22.5万两白银。继德国之后，俄、英、法各国纷纷割取中国港湾、划分势力范围。

严重的形势迫使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发扬起来，团结御侮。全国各地更进一步掀起了反割据、反瓜分以扶清灭洋，除教安民的火热斗争。

1898年6月，四川大足县龙水镇人余栋臣率众起义，发布檄文，痛斥列

强“既占上海，又割台湾”的罪行，指出了“当今胶州湾立埠，国土欲瓜分”的严重危机，号召“顺清灭洋”，“除教安民”。起义军辗转30余州县，捣毁教堂20余处，很快控制了周围百里的地方。但因无统一领导和清政府的围剿失败了。事后清政府向侵略者“赔偿白银118.61万两”结案。

1898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全国各地，人心恟恟，“仇洋灭教”成为当时最动人，最有力的口号。

在贵州，遵义府仁怀县会党竖旗起义，攻入县城，捣毁行署，火烧教堂及教民房屋。

在湖南，长沙、湘潭、武陵人民极力抵制教士设堂传教，并约期攻打“洋人”。善化、长沙两县所颁布的“保护洋人”的告示，被群众“挖补”改为“有能杀一洋人而偿银二百元”。武陵县群众火烧教士书册、衣物、船只。

在福建，建瓯县居民抗议教会育婴堂虐杀婴儿，将教堂捣毁。

在浙江海门，人们手执枪炮器械，将教堂团团围住，捣毁教堂，痛打教士。反洋教斗争得到台州、乐清、临海等府县人民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在斗争中，他们曾提出了“护国灭教”，“保清灭洋”的口号，与北方“扶清灭洋”，四川“顺清灭洋”的口号联成一气。

在北方各省，酷爱自由，富有革命传统的广大人民中，一直有像金丹八卦教、如意教、大乘教、义和门、大刀会等秘密或公开的反清团体在进行着斗争。在义和团运动前夕，由于洋教势力和封建势力的压榨，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民为了反抗这种剥削，广泛组织了大刀会、义和拳等组织，掀起了全国闻名的义和拳、义和团运动。这个运动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要求和迫切愿望，因此它首先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特别尖锐的山东爆发，并迅速地在全省发展起来。后来配合直隶等地的义和团力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席卷华北，波及全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嚣张气焰。

近代史上的反洋教运动，是帝国主义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侵略的必然产物。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除了极少数卖国的统治者外，广大爱国的中国人民是深恶痛绝的。

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都是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加深而扩大的。传教士作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一开始就侵犯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和经济利益，他们无法无天、无恶不作，很快就暴露了自己的丑恶嘴脸；他们在“劝人为善”的掩饰下，侵犯中国人民的利益；他们强迫人民改变信仰，霸占土地，掠夺财富，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包庇教民，践踏人权；他们想方设法渗透到内地，搜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积极充当殖民统治者对外侵略扩张的开拓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中国人民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为了保卫祖国的安全、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从事侵略活动，奋不顾身地与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持续的搏斗。

近代中国的反洋教运动，此起彼伏，前赴后继，几乎连年不断。发生斗争的地区，北自黑龙江，南至广东，东起沿海，西迄边鄙，几乎遍及全国。参加斗争的群众非常广泛，有城乡劳动人民、流氓无产者、兵丁吏役、以及封建官员、地主士绅等等，几乎包括社会各阶层。

随着反洋教运动的发展和进一步深入，人民反对的目标已不仅仅限于教会、教堂及传教士和教民了。由于逐渐地认识到了“洋教”和殖民主义的关系，反对的目标扩大了，包括了所有的帝国主义分子。这使反洋教运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人民在斗争中，一方面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同时也教

育了自己，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这种斗争性质的转变，表明了中国人民已逐渐由自发性的反洋教斗争转变成了自觉性的反帝斗争。但毋庸讳言，它仍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到了 19 世纪末，由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迅速加深，中国封建统治者死心塌地地投靠了帝国主义，实行了可耻的投降卖国政策。所以，人民的每一次反洋教运动，都是以清朝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镇压、对帝国主义者的赔偿道歉而告终。为了顺从侵略者的“惩凶、赔款”的要求，清政府在每一次教案发生后，都给帝国主义以大量的赔款，惩办了大批无辜的百姓。清政府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都是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的进一步觉醒，从而使他们走向了推翻清政府统治的道路。

反洋教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充沛的爱国热情和坚强的革命毅力，显示了中华民族无限蓬勃的生气。它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戳穿了所谓“同治中兴”和“中外和好”的无耻骗局，给全国人民进行了广泛的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动员了千百万人民起来战斗。

义和团运动是反洋教运动的最高潮，反洋教斗争始终贯穿于义和团运动之中。义和团运动的革命洪流，是由数以千次涓涓滴滴的反洋教斗争汇合而成的。义和团运动是全国性的大教案。

反洋教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传教士在哪里进行侵略活动，人们就在哪里进行反洋教斗争，并且遍及于整个中国。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这一段时期，每次反洋教斗争几乎都捣毁了传教士进行侵略活动的大本营——教堂，或赶走传教士。这种斗争打击了传教士的反动气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抵制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向中国内部地区进行渗透的作用。在全国各地的反洋教斗争和后来北方义和团运动的打击下，侵略者认识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不得不使传教士在华的侵略活动有所收敛。当时英国外务相对传教士说，以后传教，不必过于踊跃，要小心谨慎。

但是，反洋教运动基本上是农民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落后的成份。例如，斗争往往带有笼统的“排外主义”色彩。凡是与外国有关的，一概反对。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的认识正处于表向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而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这种认识是从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人民群众在对外立场上和清朝统治者日益显现了尖锐的对立，认识到爱国必须革命。20 世纪初年，清朝朝廷已如风中之烛，朝不保夕了。

